|  |  |  |  |  |
| --- | --- | --- | --- | --- |
| Macintosh HD:Users:bilodeau:Desktop:logos:template 2017:un.emf | **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 | **CBD** | | |
| **CBD_logo_ch-CMYK-black [Converted]** | | |  | Distr.  GENERAL  CBD/SBI/3/4/Add.1/Rev.1  1 Decem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第三次会议（续会）

日期和地点待定

议程项目5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传播工作

执行秘书的说明

# 一. 背景

1. 缔约方大会第[14/34](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34-zh.pdf)号决定提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应配套推出一项鼓舞和激励人心的2030年使命，作为实现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景的踏脚石，并为此制定一个协调一致、全面和创新性传播战略。
2. 本文件提出制定这一传播战略的框架，用以取代第[XIII/22](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22-zh.pdf)号决定核准的传播战略框架。当前这个版本已由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正式咨询委员会（CEPA-IAC）和参加“生物多样性传播舰队”活动的传播专家（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政策领域各利益攸关方的代表）作过审视。
3. 本文件首先简要介绍行为转变和传播之间的关系，提出传播战略内容大纲。传播战略的定稿将根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最终商定文本和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的相关决定进行调整。之后将不断对传播战略进行审查，详见第三节所述。

# 二. 传播、意识和行为转变

1.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强调传播和意识对于实现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重要性：“至迟到2020年，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他们能够采取哪些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如《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国家联络点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协调员工具包》[[1]](#footnote-2) 所述，公众意识是“培养理解和关注、帮助人们了解问题、使问题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或把问题列入议程的第一步”。而教育则“培养对问题的理解，澄清价值观，培养对环境的关注态度，培养为环境采取行动的动机和技能”。
2. 证据显示，2011-2020十年间取得了进展，如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和“濒危物种保护组织”[[2]](#footnote-3) 意识跟踪系统所报。其他近期报告和举措也显示意识得到增强：
3. 生物贸易伦理联盟“生物多样性晴雨表”发现，2020年，在一组接受调查的核心国家（巴西、法国、德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78%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生物多样性，高于2010年的67%；[[3]](#footnote-4)
4. 经济学人智库[[4]](#footnote-5) 最近的“生态觉醒”报告显示，关注自然丧失的人数急剧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增长发生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5. 益普索莫里为全球公域联盟[[5]](#footnote-6) 编写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国集团国家中，四分之三的人（73%）认为，由于人类的行为，地球正在走近潜在的突然或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五分之三的人（58%）非常关心或极其关心地球的状况。
6. 这些报告所报的增强率有高有低，且不涵盖所有国家。意识的显著增强并未转化为足以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未能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就是证明。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需要转变社会模式和人类行为，需要所有人——不论是政策领域的决策者、投资者、消费者、企业、公民、教育工作者还是其他人——将增强的意识转化为行动。[[6]](#footnote-7)
7. 研究表明，人类行为根植于一个贯穿自身、人际、社会、经验、情感、身体、技术、政治影响的复杂系统。这些因素界定行为的边界条件，为不同行为模式派发意义和文化影响，决定人们做出日常决策和为生物多样性采取行动的能力。
8. 大量科学证据表明，与其他心理变量相比，在传播活动中全力解决对问题的意识，对于创造行动意愿和行为转变意义不大。仅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是不够的。促进环境友好行为的理论认为，行动是旨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个人或社会规范作用指引下的社会友好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旨在促进环境友好行为的干预措施都需要解决多重决定因素，特别是态度、个人道德信仰、社会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等。
9. 可把自我调节的行为转变理解为个人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作出可持续行动的决定，筹备行动，付诸实施，然后使之成为一种习惯。[[7]](#footnote-8) 要想成功走完转变的各个阶段，达成新的可持续的行为，传播工作必须触及态度、社会和个人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等关键心理变量。
10. 为了帮助度过这些阶段，形成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继续坚持有利于这些生活方式的做法，必须为每个阶段和特定目标群体及其生活环境（例如青年、政治决策者、社会弱势群体、高收入群体）设置不同的支持机制，包括传播。这涉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任何传播计划。
11. 传播战略需要增强意识，但也需要影响意图和规划。一个长期传播战略的设计需要逐步积累内容，使战略部署人员在短期内分享数据，并在中期和长期内发展一个持续的研究和评估进程。这一进程应侧重于更好地理解社会行为体、他们的意图、态度和规范以及他们的信仰、看法和选择。应利用这种理解来监测成果并不时对战略进行调整。[[8]](#footnote-9)
12.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成就的基础上更新和修订传播工作提供了一个机会。传播管理还需要不断了解和评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长期目标和里程碑的实现情况。这样做将有助于为传播战略创造内容，为实施中的举措和成果监测提供连续性和支持。

# 三. 传播战略的范围和目的

1. 传播战略供执行秘书组织传播活动所用，也有助于所有其他各方，包括缔约方、利害攸关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联合国系统行为体等，开展传播工作：
2. 为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一个结构；目标是提高和扩大效力；
3. 作为政治决策者、社会企业家、企业、公民、青年、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在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制定具体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初步指导；
4. 促进行为转变，支持保护、可持续利用、公平分享利益和转型性变革；
5. 促进行为转变和报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执行情况之间的互动。
6. 传播战略需要在传播和行为转变专家的协助下，以参与、迭代和灵活的方式实施和进一步完善。其进一步完善应在执行秘书领导的国际层面的咨询和协商下进行，并指导进一步的协商。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教育专家、青年、不同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代表的积极参与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确保充分纳入代内和代际、文化间和性别方面的考虑。在全球层面，传播战略的近期和长期调整将由一个开源协调机构进行协调，见下文所述。
7. 缔约方大会将参考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正式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以及“生物多样性传播舰队”[[9]](#footnote-10) 和其他机构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传播司和联合国全球传播部的投入，对全球传播战略不断进行审查。
8. 审查的职权范围如下：
9.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之后举行一个初步研讨会，拟定全球传播战略的最后细节；
10. 对已经开展的活动进行两年度评价，找出最佳做法、意识变化、影响和有效性；
11. 确定传播和学习的新领域，找出现有传播战略中需要调整之处；
12. 对照行动目标、长期目标和2030年使命的进展情况跟踪传播、教育和增强意识活动；
13. 找出需要接触的新行为体或合作伙伴；
14. 确定资源需求。
15.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后应立即制定国家版本的传播战略，此后将其作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执行进程的一部分进行审查，包括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进行审查，并应考虑将国家传播战略纳入今后版本的国家报告。这些战略应列出支持以下目标的工具和活动。
16. 表1概述传播战略部分活动的时间表。

**表1. 活动时间表**

| 日期 | 执行秘书 | 国家层面 |
| --- | --- | --- |
|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后立即进行 | 召集CEPA-IAC和相关行为体会议，制定详细的国际战略文件，向国家层面提供进一步指导  创建网站  召集非正式协调机制进行定期协调  拟定对传播监测框架的投入 | 根据执行秘书的指导文件，制定国家、次国家和部门层面的传播战略，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报告。  为开展传播战略活动建立国家和次国家层面伙伴关系。 |
|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两年期 | 为传播战略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 缔约方、执行国家传播战略的利益攸关方。 |
| 到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2024)[[10]](#footnote-11) | 与CEPA-IAC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合作，审查和报告活动情况，根据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的建议对传播战略进行调整 | 通过国家报告或其他机制报告两年期活动情况，视需要进行调整。 |
| 到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2026) | 与CEPA-IAC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合作，进行十年中期活动审查和报告，根据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的建议对传播战略进行调整 | 通过国家报告或其他机制提交十年中期活动报告，视需要进行调整。 |
| 到缔约方大会第十八届会议(2028) | 与CEPA-IAC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合作，审查和报告活动情况，根据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的建议对传播战略进行调整 | 通过国家报告或其他机制报告两年期活动情况，视需要进行调整。 |
| 到缔约方大会第十九届会议(2030) | 编写活动情况最后报告 | 活动情况最后报告。 |

**四. 目标**

1. 传播战略组织的宣传、教育和增强意识工作要支持为实现2030年使命而采取的全社会行动，包括那些旨在实现长期目标、行动目标和支撑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变革理论的行动。总体而言，传播战略不仅旨在促进实现2030年使命，还旨在促进实现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
2. 根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初稿（CBD/WG2020/3/3），“所有利益攸关方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宣传、认识和理解对于切实有效的执行工作至关重要，其中包括：
3. 更多地了解、认识和领会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包括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相关知识、价值观和方法；
4. 使所有行为体更多地认识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的存在以及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5. 促进或建立平台和伙伴关系，包括与媒体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平台和伙伴关系，用以分享生物多样性行动方面的成功信息和经验教训。”
6. 这方面的主要目标如下:

**目标A**

**更多地了解、认识和领会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包括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使用的相关知识、价值观和方法**

1. 本目标继续支持过去十年在爱知目标1下开展的工作，但有重要区别。应当指出，本目标不仅仅是爱知目标1的延续，它将重点放在行为转变，特别是通过解决和改变规范、意图、知觉行为控制和态度实现行为改变。列入“了解”和“领会”概念为解决行为转变模式中的“预先决定”因素，如规范和个人知觉，提供了基础，以培养为生物多样性采取行动的意愿。刻意列入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相关知识、价值观和方法也扩大了讨论和潜在行动的范围。本目标的实现需要下列活动的支持：
2. 使用共同数据框架和参照物，对认识和态度的改变进行基线研究和监测。这包括支持描述生物多样性不同价值的研究计划；
3. 组织提高认识活动展示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4. 体现和宣传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传统知识和实践中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观的产品和研究；
5. 支持制作关于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的多媒体故事和叙事的媒体和电影项目；
6. 为教育机构开发和/或分发教育材料，帮助传播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7. 修订教育课程，纳入生物多样性价值观和重建与自然的联系的重要性；
8. 通过教育促进重建与自然的联系，作为改变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一个途径。

**目标B**

**使所有行为体更多地认识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的存在以及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1. 增强意识要与意图和行动转变联系起来。本目标要求采取一系列传播行动，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各个层面的可见度及其对所有利益攸关方的相关性。本目标还支持宣扬成果，突出执行工作，激励人们为实现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继续努力。
2. 传播工作还要促进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进展不足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采取更多行动。传播应促进积极的成果驱动措施，以积极的方式推动工作，对失败的后果提出警示，或展示如何效仿其他领域的措施以推动使命的实现。
3.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家行为体要根据监测框架中的标题指标和其他指标，通过与《公约》信息交换所机制和传播平台相连的中央门户以及国家平台，提供透明的和定期更新的进展情况。应铭记以下原则：
4. 应以透明为目的，根据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提供的指导，包括一个模板，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国家报告建立关键信息；
5.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监测和评价结构，在与目标实现情况挂钩的同时，还应酌情包括行为转变数据。这将需要向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和核查框架输入资料；
6. 十年期间出版的一系列定期报告，包括一份全球差距报告，提供框架的最新情况和进展；
7. 对于非国家行为体，还应考虑通过从沙姆沙伊赫到昆明——自然与人类行动议程等机制进行报告；
8. 推广CitiesWithNature承诺平台和RegionsWithNature平台，这两个平台提供在线机制，便利城市和地方政府自愿承诺为国家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作贡献，并可比照其承诺监测和报告进展情况。

**目标C**

**建立和促进平台和伙伴关系，包括与媒体、教育工作者、民间社会之间的平台和伙伴关 系，用以分享生物多样性行动方面的成功信息和经验教训**

1. 这些方面的数据应以传统和在线格式提供，方便媒体和教育工作者获取并编成媒体文章和教材。与这方面的媒体和教育专家建立伙伴关系是向前迈进的重要途径。所有指标的数据来源和基本原理应易于查阅，并以专业和通俗方式加以解释，与监测框架的讨论挂钩。
2. 关于监测工作的传播应每年或每两年有一个宣传期，与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或其他适当活动相结合。今后出版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其编写和发布也应考虑到传播执行工作的需要。
3. 应鼓励其他行为体酌情与执行秘书协调，发表报告宣传经验教训或成功信息。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的《 地球生命力报告》可以包括一个有助于评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执行情况的章节。可鼓励世界经济论坛在其报告中专门讨论框架的执行情况。环境署的《全球环境展望》也可发表讨论框架的专刊。可考虑由环境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全球环境基金、蒙加贝、全球林冠、鸟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全球景观论坛和其他机构发表其他定期报告。
4. 需要开展合作，促进和制定方法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教育系统，培养学生掌握为生物多样性和地球而行动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通过创建和促进连接家庭、学校、社区行为体、动物园、水族馆、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公共机构以及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学习生态系统”来这样做，将生物多样性意识和知识直接转化为实地行动。
5. 通过向所有年龄的学生提供工具用于设计新的可持续系统和生活方式，也有可能促进他们个人和社会的变革行动。教育工作需要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教育和传播委员会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协调，协助与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环境中的教育工作者接触。

**目标D**

**展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气候变化、土地退化、人类健康、人权、公平、可持续发展等全球主要挑战的相关性**

1. 传播工作将显示生物多样性与一系列主要问题的相互联系：
2. 可持续发展目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1]](#footnote-12)目标的密切联系将是实现传播协同增效的一个重要之处。两个议程的高度一致将使工作更为顺手；
3. 应制作讯息展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还应在讯息中列入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如何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议程等内容。这些讯息应强调问题的相互依存性和解决办法的相互依赖性，尤其是自然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复原力的重要贡献；
4. 同样，传播战略需要显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工作如何有助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应强调与土地退化零增长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目标的联系。
5. 还需要强调海洋议程的重要性，包括与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协同增效。[[12]](#footnote-13)
6. 还需要强调执行框架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重点是与“一体健康”议程、预防大流行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联系。
7. 另一个讯息领域是这些问题与人权的联系，与宣布健康环境权利的人权理事会第48/13号决议挂钩。可把特别报告员在生物多样性和人权方面的具体工作作为讯息的基础。

**五. 受众**

1. 《公约》的受众遍布全球，因此应细分受众群体，向不同群体宣传战略的不同目标，并相应设计讯息，同时顾及色调和视觉效果方面的文化差异。对于以下受众群体，应注意他们既是讯息的受众，也是向下属受众传送讯息的转化者和/或转递者。
2. 应注意其中一些受众起着讯息倍增器的作用，要根据其需要调整传播战略。其他受众是传播活动的对象。

**A.《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和其他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方**

1. 《公约》由各国政府在国家层面执行，因此，执行秘书为这一受众所作的工作是提供工具，帮助各国的《公约》及其议定书联络点制定战略，与各部委和政府部门沟通，建立区域或国家传播和教育联盟。这是为了确保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他部门包括正规、非正规、非正式教育部门工作的主流。《公约》缔约方将需要组织国家传播进程，包括相关的咨询委员会。
2. 次国家政府和其他地方当局——包括城市当局——负责规划、协调、监管、监测和执行生产和消费模式。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定的多达三分之二的生物多样性行动目标要靠它们完成。正是在地方一级，城市展现出实施和确保转型性变革的能力。它们既是重要受众，也是向居民传送信息的重要转递者。
3. 缔约方应制定本国的传播和教育活动，支持行为转变，使其符合国家为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而制定的政策。因此，所有讯息和结构都要与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B.《公约》的专门受众**

1. 缔约方是《公约》关注的重点，但也有一些其他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向缔约方提供支助，或在执行《公约》方面发挥单独作用。由于这些行为体不是缔约方，面向他们的传播将具有不同性质。同时，当这些行为体在国家层面开展支助活动时，可将其包括在传播活动中。
2. 参与《公约》工作的联合国系统伙伴和其他区域组织也很重要。这些行为体不仅将把《公约》的工作传递给其他行为体，还将利用这一机会宣传自己的工作及其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性。将邀请联合国全球传播部设立一个生物多样性传播小组，负责与执行秘书合作，协调整个系统的传播工作。还将邀请环境署传播司设立一个专门传播联络点。将邀请教科文组织贡献其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专门知识。
3. 各多边环境协定，无论是否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都将是重要的倍增因素和协调点。为此，应邀请联合联络小组、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将议程传播工作作为其年度议程上的一个常设项目，并应指定联络点。
4. 自然历史和科学博物馆、植物园和国家保护区系统、动物园和水族馆，这些实体的工作对《公约》也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具体的保护行动、保护研究还是在增强对生物多样性的意识方面。将邀请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植物园保护国际、欧洲科学中心和博物馆网络等大型协会协调传播工作。2020年3月以来，由欧盟委员会协调的“United for Biodiversity”全球联盟汇集了所有这些机构和组织，并向世界各研究中心和大学、自然保护区、各类博物馆包括艺术、建筑或历史博物馆开放，以汇集所有展示自然对人类重要性的世界机构。
5. 设有国家分会的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传播工作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它们可以传播战略信息，为促进保护、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享惠益的良好做法提供参考模式。秘书处和《公约》缔约方与这些组织有悠久的合作历史。
6. 金融和企业界是传播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受众。作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用户，其业务对生物多样性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企业是否能够支持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对于实现《公约》的目标至关重要。在这方面：
7.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挂钩很重要；
8. 生物多样性行动的商业和金融企划是传播的坚实基础；
9. 作为遗传资源的使用者，企业在《名古屋议定书》获取和惠益分享中也有重要 作用；
10. 现有的企业主导的倡议、企业协会、联盟和网络，如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商业自然联盟、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队，将是沟通这些受众的重要倍增因素。
11. 从事或负责教育和学习——如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自然教育、保护教育和全球教育——的全球、区域和国家组织，在学习和行为转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教科文组织所建议，“应该更加重视教育中的环境主题，特别需要增加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因此，教育组织、当局和决策者是实现《公约》目标的相关利益攸关方。

**C.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1. 必须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合作，宣传他们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展示他们的活动如何有助于执行《公约》和其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在这方面，传播应使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能够在区域和国家执行《公约》中分享他们对自然的理念，突出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传统知识和做法。
2. 还应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工作视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平分享惠益的做法和教育方法的重要来源。在这方面，传播应寻求在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个层面庆祝、促进和宣传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传统知识。这应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充分和事先知情同意下进行，并尊重所有传统知识和做法的使用条款。

**D. 公众**

1. 诚然，传播的受众是全球性的，应该涵盖每一个人，但将公众视作一个单一体，可把所有讯息瞄准这个单一体，则显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想法，忽视了受众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所谓“公众”是指不同的受众群体，其国家、文化、性别、社会经济水平、教育、经验、年龄和语言各不相同，对每个群体都需要有针对性的方法。
2. 国家是最重要的公众组成部分。对生物多样性、环境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与广大公众的相关性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情，取决于人与自然以及生物多样性如何为其提供价值的国家“叙事”。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努力，通过一个总括叙事，吸引公众参与。
3. 与公众沟通的重要途径包括增强意识活动、教育和媒体，包括广播、电视和印刷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应将媒体视为一个倍增因素和渠道，如下所示。
4. 应动员文化艺术界参与传播，激发新形式的创造力和人类想象力，促进所需的转型性变革。艺术和新的文化范式可成为转变意图的有力工具。

**E. 媒体**

1. 不同媒体平台、媒体组织和媒体代表是关键所在。必须吸进所有区域的媒体。大型通讯社、全国性连锁报纸、大型媒体集团都要吸引进来。应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探索建立媒体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工作可包括制作定期新闻特稿和“新闻胶囊”，创建开源“B-roll”视频素材共享库等。
2. 应优先吸引地球新闻网和环境记者协会等关注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环境问题的记者协会参与。
3. 除了新闻机构，还应探索与影视制作机构合作的可能性。应努力鼓励为电视和流媒体平台制作影片，突出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不同问题。作为报道的交换，新闻机构可以自由使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品牌。应探索与亚马逊、英国广播公司自然历史、迪士尼自然、艾肯影业、国家地理、Netflix等重要全球制作公司合作的可能性。此外还应联系区域制作公司。
4. 应鼓励世界各地举办电影节。杰克逊野生动物（前称杰克逊霍尔野生动物电影节）、国际野生动物电影节、Wildscreen可能会出品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影片。应鼓励联合国各区域的其他国际和区域电影节创作支持自然保护行动的电影类别。应考虑在缔约方大会每届会议上举办电影节的可能性。还应考虑在每年庆祝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时同时举办电影节。

**F. 青年**

1. 青年，包括他们的组织和代表，是制定和执行传播战略活动的重要受众和坚强伙伴。接触这些重要行为体的途径包括：联合国系统开展的青年活动包括国际青年气候行动组织、全球青年生物多样性网络及其国家分会、其他举措如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和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青年咨询小组。

**G. 妇女**

1. 妇女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因此应特别注重将性别平等纳入所有活动的主流。传播战略的工作应补充和借鉴正在制定的2020年后性别平等行动计划。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是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可以在国际层面与之开展协作和协调。性别考虑应是所有材料和讯息的中心内容。

**六. 品牌**

1.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应有一个明确的全球品牌，该品牌可扩展到其他范围（国家、地方），其使用和许可条款应简易方便。品牌可用声音、特性、承诺、价值、针对性和定位等维度呈现，如表2所示。

**表2. 品牌元素**

|  |  |
| --- | --- |
| 声音 |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全球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未来生活的努力和愿望。 |
| 特性 | 视觉外观，包括调色板、徽标、字体和视觉规则，要体现声音、多样性生命包括人类表征。应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整个执行期间使用这一特性。 |
| 承诺 | 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和2030年使命代表品牌的承诺。 |
| 价值观 | 品牌价值观反映《公约》的目标和联合国的原则。 |
| 针对性 |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总体覆盖范围是全球性的，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受众对品牌进行具体阐述。 |
| 定位 |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被呈现为所有生物多样性工作的全球框架，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

1. 品牌将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完成之后创建。此事由执行秘书领导，CEPA-IAC、联合国全球传播部、环境署传播司和下文阐述的开源协调机制协同。应与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营销公司签约协助完成这项工作。希望这家营销公司将无偿工作，但应获得种子资金。

**七. 开源协调机制、渠道和倍增因素**

1. 将根据上文第三节所述职权范围不断审查传播战略大纲，但执行全球层面传播战略最好通过一个开源协调机制来进行。这种机制的参与成本低，成员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某些项目而不参与其他项目。小组共享的产品应遵循开源原则，秉持包容性、透明性和中立性。
2. 开源协调机制属于自愿参加，向致力于透明参与和遵守开源工作原则并为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贡献的所有行为体开放。鼓励国家和次国家政府的代表以及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行为体、企业、青年、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妇女的代表参加。开源协调机制没有正式决策权。
3. 在国家层面，缔约方可酌情自由建立机制。所建机制应具有包容性和透明度，并应确保所有相关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包括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青年和妇女的充分和有效参与。

**A. 社交媒体**

1. 传播战略需要利用现有社交媒体和新技术。详尽列出要使用的技术并不适宜，因为这些技术的平台因地区而异，而且社交媒体领域的变化速度很快，某些平台会随时间流逝而过时。尽管如此，实施传播战略时应力求使用最新的平台和技术，包括通过企业伙伴关系。需要考虑到不同法律所涵盖的数据安全和对用户所有隐私权的保护。
2. 需要为每个平台建立一个商定的主题标签和通用标签词列表，以适当汇总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对话。这些应与上文概述的讯息中心保持一致，并翻译成其他语文。列表应由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之后第一次协调会议制定。
3. 应建立与谷歌、元宇宙、微信、微博、推特和领英等社交媒体组织的伙伴关系，以做到在专项运动和其他宣传活动中突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讯息和进展。

**B. 活动**

1. 活动场合是重要的传播机会。媒体云集、万众关注的场合有助于向广大受众传递讯息。这些活动包括下列机构的会议:
2.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5.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6. 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缔约方大会；
7.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8. 联合国大会；
9.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10. 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11. 联合国环境大会；
12. 世界经济论坛；
13. 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
14. 与生物多样性议程有关但又与之不同的国家活动也是重要的传播机会。国家文化庆祝活动或独立庆祝活动也可以用来宣传生物多样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
15. 联合国国际日和其他国际日也是宣传和庆祝《公约》工作的重要活动场合。在这些国际日期间，应设法使传递的讯息显示《公约》的执行如何有助于实现国际日的目标。需要考虑的一些最重要的国际日包括：世界湿地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世界水日、国际森林日、国际妇女节、世界卫生日、地球一小时、海洋日、地球日、地球母亲日、地球透支日、世界环境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世界城市日、世界土壤日、世界粮食日。
16. 对于任何传播工作而言，每年5月22日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也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活动。在执行秘书确定的主题的指导下，国家层面的行动体应利用这一天阐述国家愿景和对策。

**C. 倡导者、和平使者和亲善大使**

1. 应设立一个“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倡导者”项目，用以表彰成就，激励人们为实现框架而行动。倡导者项目应设立奖项，例如个人、青年、组织、企业和政府奖项。项目在每年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布奖项。应指定一个为奖项提供资助的赞助商和一个全球媒体合作伙伴。奖项将由一个由环境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开发署、生物多样性平台、世界经济论坛、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自然保护联盟的代表以及执行秘书等人组成的小组提名。提名将提交执行秘书。
2. 应请联合国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置一名和平使者，并为每个联合国区域任命亲善大使，以支持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些大使将提供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讯息。

**D.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宣传网站**

1. 应建立一个具有唯一URL和标识、与上述品牌相符的专用网站。它不同于《公约》主网站。它侧重于在自我调节行为转变模式的每个阶段吸引受众，引导受众找到最适合个人旅程的资料，无论这种资料处于何处。它将与相应的社交媒体活动紧密结合，并可将信息范围缩小到特定国家。
2. 这将需要尽早和持续关注搜索引擎优化、可访问性、与社交媒体活动协调、分析、通过InforMEA实现《公约》内其他信息来源（《公约》主网站、国家和中央信息交换所机制等）与机构和专题伙伴的双向互操作性。可能需要开发国别电子邮件列表。
3. 网站还可以充当可重复使用媒体资料的媒体中心，包括公共资料和合作伙伴专用资料。

**八. 主要讯息**

1. 根据第XIII/22号决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讯息需要与先前制定的讯息保持一致，包括关于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和联合国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讯息、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结论、《公约》总体讯息等。
2. 讯息需以证据为基础，在科学上可信，借鉴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工作及其全球评估报告等。还需符合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相关传统知识。
3. 传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宣传转型性变革和行为转变的重要性。为了促进行为转变，主要讯息将考虑科学证据，讨论规范、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图。
4. 讯息的要素如下：
5. 总体而言，讯息应传达人与生物多样性联系的普遍要素，显示人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与生物多样性联系在一起；
6. 讯息应促使人们立即采取行动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鼓励利益攸关方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内采取行动，以此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7. 讯息还应突出长期前景和里程碑，包括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13]](#footnote-14)《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进程有时限的目标等；
8. 还应包括在走向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进程中实现公平的重要性；
9. 讯息还应将框架的长期目标与国家具体发展优先事项以及地方和次国家政府在落实上述优先事项中的重要作用联系起来，表明实现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中；
10. 具体讯息和活动应顾及目标受众的价值观，在其价值观范围内表达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行动。因此研究受众是量身定制讯息的重要一环；
11. 下表3所示讯息结构旨在建议讯息的方向。建议所有行为体采用一套总体讯息，用于公众动员和宣传运动；
12. 具体部门的讯息针对具体受众，由参与这些部门的组织机构制定；
13. 讯息结构也将遵循“开源”运动的原则，保留核心讯息，但允许不同组织在自身品牌下加以修改。这些讯息将设置迭代，用于国家和次国家层面；
14.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之后，执行秘书将与CEPA-IAC和其他相关行为体举行一次研讨会，制定详细的顶层讯息和创建讯息的准则；
15. 邀请缔约方举办创建讯息的国家研讨会。

**表3. 讯息主题**

| **顶层讯息：**通过为自然/生物多样性而行动，我们都能创造一个更公正、更健康、更可持续的世界 | | | |
| --- | --- | --- | --- |
| **一般主题** | **公众讯息** |  | **政策讯息** |
| 自然/生物多样性关系到我们的繁荣、幸福和福祉 | 待定 |  | 待定 |
| 自然/生物多样性具有内在价值 | 待定 |  | 待定 |
| 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机危及人类生存 | 待定 |  | 待定 |
| 影响我们星球未来的计划必须公正、包容和公平 | 待定 |  | 待定 |
|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正将自然/生物多样性推向崩溃的边缘 | 待定 |  | 待定 |
| 我们与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破裂，使人类面临更多大流行病风险 | 待定 |  | 待定 |
|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健康 | 待定 |  | 待定 |
| 为了保护地球我们都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待定 |  | 待定 |

**九. 计量进度**

1. 评估传播战略的进展情况要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的进展情况以及衡量覆盖面和效果的传统指标相结合。评估工作还需捕捉随时间发生的重要价值变化，评估国家和全球层面行为转变和为生物多样性而行动的意愿方面的进展。

**A. 活动和媒体覆盖面**

1. 在全球层面，协调机制的合作伙伴应向执行秘书报告活动的结果和媒体的覆盖面（包括社交媒体的覆盖面）。可用一个类似于<https://www.cbd.int/article/people-for-our-planet-aggregator>的聚合工具汇总举措。
2. 在国家层面，《公约》缔约方也应收集上述数据并向执行秘书报告，并将这些数据列入国家报告。

**B. 与行动目标的联系**

1. 传播战略的进展还需要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的进展角度来计量。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和核查框架还应包括信息和数据，显示实现行动目标与行为转变的联系。这种数据的性质应在关于监测和核查的讨论中审议。
2. 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期间编写的各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包括一个增强版，应专门报告行动目标的进展情况。
3. 其他机构和组织的报告也应提供更多的进展信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世界经济论坛的出版物、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环境署的《全球环境展望》都可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期间专门讨论框架下的成果。

**十. 资源**

1. 执行秘书和国家层面的活动都需要资源。资源需要量将随着传播战略的进一步拟定而确定。需要的资源将包括：
2. 执行秘书需要传播股有人手处理传播战略事务，并需要每年有资金制作宣传材料。这些将超出现有员额资源；
3. 联合国环境大会不妨核准一个资金封套，供包括传播司在内的环境署各司使用，用于支助传播战略。还应酌情调动世界环境日和《全球环境展望》专用资源，支助传播战略；
4. 联合国全球传播部不妨比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组建一个传播团队来支持传播战略；
5. 各国政府需要为传播战略划拨一个预算套封，作为支持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部分；
6. 有兴趣的私营部门行为体、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行为体和其他实体，如联合国基金会，可考虑设立基金支持传播战略，并为此建立自愿机制。营销和其他媒体组织可酌情考虑提供无偿服务；
7. 应邀请全球环境基金为在国家层面执行传播战略提供支持。

\_\_\_\_\_\_\_\_\_\_

1. <https://www.cbd.int/cepa/toolkit/2008/doc/CBD-Toolkit-Complete.pdf>。 [↑](#footnote-ref-2)
2. <https://ontheedge.org/impact/sentiment-tracker>。 [↑](#footnote-ref-3)
3. <http://www.biodiversitybarometer.org/#uebt-biodiversity-barometer-2020>。 [↑](#footnote-ref-4)
4.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an_ecowakening_measuring_awareness__engagement_and_action_for_nature_final_may_2021__.pdf>。 [↑](#footnote-ref-5)
5. <https://www.ipsos.com/ipsos-mori/en-uk/global-commons-survey-attitudes-transformation-and-planetary-stewardship>。 [↑](#footnote-ref-6)
6. Klöckner, C. A. (2019). “让人们改变—保护领域的环保传播战略和新途径”. In: Reese, G., Römpke, A.-K., Mues, A. W. and Bockmühl, K. (Eds.), *Green Ways –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Research*. BfN-Skripten, 529 (pp. 21–28). Federal Agenc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Germany。 [↑](#footnote-ref-7)
7. 见Bamberg, S. (2013). 改变有害环境的行为: 自我调节行为转变的阶段模型.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4, 151–159。 [↑](#footnote-ref-8)
8. Williamson, K., Bujold, P. M., and Thulin, E. (2020). 实践中的行为转变干预: 标准、方法、案例研究和指标综述. Rare Center for Behavior &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dvisory Panel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https://behavior.rar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Behavior-Change-Interventions-in-Practice-final.pdf>。 [↑](#footnote-ref-9)
9. 2019年11月21日和22日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三次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边专家会议，一组《公约》缔约方、联合国机构、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民间社会组织、青年、妇女、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合并成一个特设传播协调小组，称为“生物多样性传播舰队”。舰队成员可自由选择参加某些项目而不参与别的项目。舰队共享产品实行开源原则，秉持包容性、透明性和中立性。其重点是促进生物多样性/自然议程，目标是支持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舰队的协调和组织机制包括电子邮件列表、WhatsApp和推特讨论小组、每周会议以及处理不同主题的特设小型工作组。 [↑](#footnote-ref-10)
10. 暂定日期，待缔约方大会最后确定。 [↑](#footnote-ref-11)
11. 联合国大会第[70/1](https://undocs.org/zh/A/RES/70/1)号决议。 [↑](#footnote-ref-12)
12. 见联合国大会第72/73号决议，第292段。 [↑](#footnote-ref-13)
13. 缔约方大会第[X/2](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0/cop-10-dec-02-zh.pdf)号决定. [↑](#footnote-ref-14)